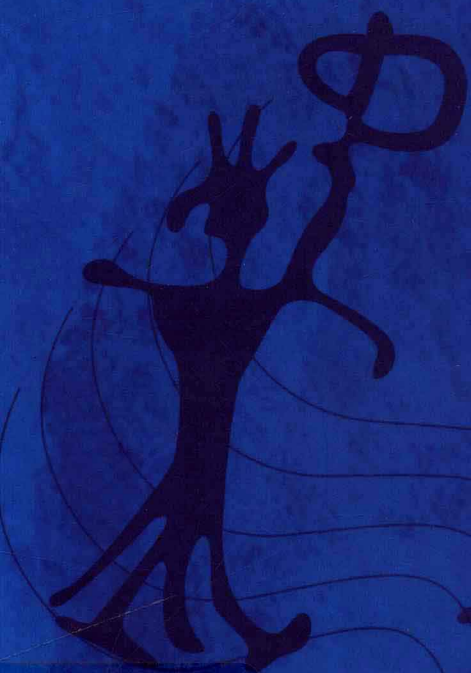


蒙古族长调民歌

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

乌兰杰 著

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研究课题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乌兰杰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80723-515-6

I. ①蒙… II. ①乌… III. ①萨满教-宗教音乐-研究-蒙古族
IV. ①J6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1296 号

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

著 者	乌兰杰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封面设计	陶 冶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话 0471-4919981 邮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呼和浩特市圣堂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75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23-515-6
定 价	25.00 元

自序

——学习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收获与感悟

一、《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一书的缘起

对于蒙古族来说,原始萨满教乃是草原文化的源头,绿色艺术的渊薮,无论从历史的或现实的角度来说,均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蒙古族音乐理论工作者,我学习和研究萨满教音乐已有 40 多年时间。上世纪 60 年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读书期间,曾两次回到故乡去采风,主要是搜集民歌。同时也遇到一些萨满教巫师,顺便进行采访,记录下他们的萨满教神歌和舞曲。另外,有些年迈的歌手和说书艺人是萨满教信徒,精通萨满教歌舞。据歌手们说,萨满巫师应邀到村子里行巫作法,有时人手不够,便邀请他们参加萨满教歌舞表演。有些业余爱好者的表演技艺,甚至超过了萨满教巫师本身。于是,我在采集民歌和说书音乐的同时,随手记录下他们所掌握的萨满教歌舞音乐以及有关萨满教的传说故事等。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对萨满教真正产生兴趣,那还是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事情。早在大学时代,我即立志撰写一部《蒙古族音乐史》,并着手做准备工作。查阅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每每看到有关蒙古族萨满教的资料,即做抄录和梳理。日积月累,积少成多,逐步熟悉了蒙古族萨满教的历史概貌,既掌握着萨满教采风资料,又了解了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大体具备了研究萨满教的基本条件。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国内外掀起了一股“萨满教文化热”。蒙古族音乐理论界也闻风而动,人们将目光转向了萨满教音乐。1985 年,我的第一部理

论专著《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出版了,其中有一篇《青铜骑士之歌》,便是对科尔沁地区萨满教资料的梳理、考据和注释。我的这篇专论文章,算是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研究的最早成果之一。

1993年,我从内蒙古来到北京,调入中央民族大学,从事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工作,对蒙古族传统音乐展开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萨满教音乐。自1998年以来,我陆续出版了《蒙古族音乐史》、《草原文化论稿》、《中国元代音乐史》等专著,其中均包括萨满教音乐和萨满教文化方面的内容。

俗话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对蒙古族萨满教文化所做的研究考证,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们在研究蒙古族萨满教或者文学史时,往往引用我所提供的资料。原国家民委文精先生主编《蒙古族文化大词典》时,还邀请我撰写蒙古族萨满教方面的词条。于是,我不揣冒昧地为该书撰写了一百余条萨满教词条。

《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一书,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但动手写作的缘由却出于偶然,应验了“长期准备,偶然得之”那句话。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所工作期间,学校下达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重点课题”目录,其中就有萨满教艺术研究的科研项目。我的上司云峰先生知道我比较熟悉萨满教文化,极力主张我承担这一项目。于是,我承担起《蒙古族萨满教音乐研究》的课题。2003年底,该课题即已完成,并由专家组审核通过。如今由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对此,我谨向远方出版社社长陈莎莎女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学习和研究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几点感悟

我的本行是民族音乐学而不是宗教学,涉足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研究,则是出于业余爱好,应该说还算是个外行。好在我有自知之明,长期抱着虚心学习的态度,这么多年坚持下来,自以为多少有些进步和提高,对蒙古族萨满教文化有了一些心得和感悟。下面,就学习蒙古族萨满教文化中所遇到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一)关于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分布格局问题

我多次观察蒙古高原地图,有一次竟然发现,广袤的蒙古高原,很像是

一头正面对峙的公牛头。蒙古高原的两侧各有一条山脉,由北向南蜿蜒而下。东侧是大兴安岭山脉,西侧是阿尔泰山脉(我国称阿勒泰),犹如长在公牛头上的两支犄角。蒙古高原的南边,则是东西横亘的燕山山脉,无疑是公牛宽阔坚硬的头顶。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来看,大兴安岭——阿勒泰山——燕山,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天然分界线。大兴安岭以西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中心,诸多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成长发育的摇篮,其文化标志是长调牧歌。大兴安岭以东是山林狩猎文化的渊薮,诸多“通古斯—满”语系渔猎民族繁衍生息的场所,其文化标志是萨满教歌舞。阿勒泰山则是草原游牧文化和中亚伊斯兰文化的分界线。从蒙古族历史上看,那里既有蒙古化的突厥语系部落,也有伊斯兰化的蒙古部落。

燕山山脉是我国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天然分界线。考古学界认为,赤峰一带和张家口一带的两个地区,东西遥遥相对,形成远古时代的燕山文化通道,连接着蒙古高原和中原大地。红山文化和仰韶文化,则是通过上述两个文化通道孕育而成的文明成果。

综观蒙古族文化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山林狩猎文化时期,草原游牧文化时期以及部分地区的村落农耕文化时期。从萨满教的情况来看,无疑是产生于山林狩猎文化时期,其成熟和衰落则是在草原游牧文化时期,构成一部兴衰荣辱的壮烈史诗。值得注意的是,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萨满教是唯一能够穿越时空,贯通蒙古族三个文化发展时期的宗教形态,且至今尚未完全中断,显示出超常的生命力。

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分布格局,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大凡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边陲地带,渔猎经济成分比重较大,佛教传播较晚,且短调民歌和集体舞蹈遗存较多,草原长调牧歌不甚发达的地区,则保留萨满教文化艺术相对较多,反之亦然。例如,布里亚特、乌梁海、科尔沁等蒙古部落,便属于这样的情况。

蒙古族萨满教文化的分布,与蒙古高原上几座山脉的走向相一致。东起大兴安岭,北经萨彦岭,西至新疆阿勒泰山,形成巨大的马蹄形“萨满教文

化圈”。后来,阿勒泰山一带的卫拉特蒙古部,由于毗邻青藏高原和中亚地区,受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浸润,马蹄形“萨满教文化圈”,被藏传佛教打开了一道缺口。通过这道缺口,藏传佛教得以顺利东渐,终于形成席卷蒙古高原之势,导致阿勒泰山地区的萨满教文化进入衰微阶段。

1578年,西土默特蒙古部封建领主阿勒坦汗皈依藏传佛教,明令废止萨满教,佛教基本实现了对蒙古高原的全面控制。1627年,新疆土尔扈特蒙古部佛教高僧内济·托因(阿必达),从呼和浩特启程东行,到科尔沁地区去传播佛教。经过半个世纪的激烈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从此,萨满教失去了最后的一块战略基地——科尔沁草原,从而进入了彻底衰亡阶段。

(二)关于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的战略意图问题

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同时尊崇藏传佛教萨迦派,封西藏喇嘛八思巴为国师,授予玉印。这一“石破天惊”的事件,对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此,我曾长期思考一个问题:忽必烈为什么会作出尊崇藏传佛教的决策?难道这只是出于单纯的宗教信仰吗?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我们知道,忽必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具有宽阔的胸怀,超人的战略眼光。作为一名虔诚的萨满教徒,他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才作出尊崇佛教这一决策的呢?为解开这一历史谜团,我仔细阅读《元史》和有关文献,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原来,忽必烈之所以尊崇佛教,是从自己的最高政治利益出发的,即巩固政权、扩充势力,为将来统一中国准备条件。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

1251年,忽必烈受蒙古大汗、兄长蒙哥之命,统领汉地军政事物,并在开平设立幕府。忽必烈深知汉地的重要战略价值,从此潜心经营北方汉地,招贤纳士,启用各民族的优秀人才,慢慢积蓄自己的实力,营造坚固的战略基地,以图“思大有为于天下”(《元史》语)。

同年,西藏地区的萨迦·班弥怛去世,其侄八思巴即位萨迦派教主。忽必烈遂于甘肃六盘山会见八思巴喇嘛。

1258年,忽必烈在开平主持佛道两教辩论会。八思巴与道教人士展开

辩论,并取得了胜利,由此名声大振。

同年11月,忽必烈受命南征,指挥东路蒙古军。

1259年,李璫——镇守南部边防的汉军万户,暗中勾结南宋,图谋叛乱。忽必烈对此早有察觉,采取引而不发的策略。

同年7月,蒙哥汗率军攻打四川钓鱼台,因伤卒于军中。

1260年3月,忽必烈率军北返,火速回到开平。

同月,阿里不哥得到蒙哥汗战死四川的噩耗,随即利用其监国的特殊身份,抢先在哈刺和林召集“忽邻勒台”(会议),宣布即蒙古大汗位。

同时,忽必烈在蒙汉、色目臣僚的拥戴下,也宣布即蒙古大汗位。从此,忽必烈和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夺汗位的战争,并延续了4年之久。

5月,阿里不哥派遣阿难答儿进军西凉府,企图占据川陕,从西线包围开平,两面夹击忽必烈。于是,关中地区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对此,忽必烈沉着应对,派遣廉希宪、商挺出兵关中,迎击阿难答儿,击败敌军,初步稳定了关中局势。

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忽必烈宣布尊崇藏传佛教,封八思巴喇嘛为国师。

1262年3月,李璫发动叛乱。7月,兵败被杀。

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被迫归降忽必烈,不久即暴病而亡。关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有新的发现,四川有蒙古族陆姓人家,自称是阿里不哥的后裔,藏有家族谱牒为证。看来阿里不哥归降后并没有死,而是被忽必烈秘密安置于蜀地,隐姓埋名地活了下来。

这场战争可谓惊心动魄,战争的初期阶段,阿里不哥占据优势,采取进攻态势,而忽必烈则采取守势。然而,对于攻守双方来说,关键并不在正面战场,而是在于西线。换言之,谁控制住关中地区和青藏高原,稳定了西线,谁就在战略上占了上风。而所谓控制和稳定西线,其实质就是争取同盟者的问题。两种势力殊死斗争,处于势均力敌之时,中间势力的倒向将决定胜负。恰在双方争夺关中地区的紧要关头,忽必烈审时度势,着眼全局,毅然宣布尊崇藏传佛教,礼遇八思巴喇嘛,其战略目的就是孤立阿里不哥,壮大

自己的阵线。忽必烈十分清楚,争取西藏佛教上层支持自己,至少在战争期间保持善意的中立,无疑是一件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事情。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是一步精心策划的战略好棋。

忽必烈通过这一大胆行动,成功地换来了西藏统治者的支持,将关中地区和青藏高原连成一片,从而彻底稳定了西线,最大限度地孤立了阿里不哥,实现了击破其占据川陕、从北线和西线形成包围、两面夹击开平的战略图谋,最终保住了蒙古可汗大位。反之,如果西藏统治者果真被阿里不哥拉了过去,转而反对自己,甚至出兵参战,该是多么可怕的局面。

我们不妨这样推想,忽必烈为了取得西藏统治集团的支持,同八思巴进行谈判。当然,阿里不哥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同样不会忽视西藏地区,而是竭力争取西藏统治者支持自己。何况,阿难答儿已经占领关中地区,捷足先登,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拉拢工作。然而,忽必烈的有利条件是,早已笼络住了八思巴喇嘛,并将他留在自己身边。作为西藏的宗教领袖,八思巴在同忽必烈谈判时,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条件,要求得到丰厚的回报。从事情的后续发展来看,八思巴提出的条件很可能是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汗国只有皈依藏传佛教,才可以得到西藏方面的支持。显然,当时的情况下,忽必烈并没有选择的余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果断地作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其实,忽必烈对待藏传佛教的态度,既不同于元朝后来的蒙古可汗,更不同于土默特部的阿勒坦汗。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说,尊崇与皈依并不是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忽必烈只是做到了尊崇藏传佛教,礼遇八思巴喇嘛。其实是变通和调整,而不是全面皈依藏传佛教,当然更谈不上放弃萨满教。

战争中兼顾两翼,重视西线,从来是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忽必烈全面继承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略思想,并且加以发扬光大。蒙古汗国几十年的征战中,向来重视西线的稳定,尽量避免两线作战。例如,成吉思汗为了统一中国,力图解除来自西线的威胁,曾多次发动对西夏的战争,并最终驾崩于六盘山。成吉思汗的临终遗训是,让他的后人继承其统一中国的未竟事业。为此秘授征服金国的方略:利用矛盾,联络南宋,假道西线,从汉水一带挥师南下,进行战略大迂回,绕过正面防线,一举战胜夙

敌金国。历史证明，窝阔台汗和拖雷兄弟后来所发动的灭金战争，忠实地实施成吉思汗的上述方略，并取得圆满成功。

早在和阿里不哥进行战争之前，忽必烈即已格外留意西线方面的事物，竭力笼络西藏统治者，为日后夺取汗位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八思巴即位萨迦派教主后不久，便在甘肃六盘山上和他会见，即是最好的证明。总之，忽必烈之所以尊崇藏传佛教，显然不是一般的宗教活动，而是他“思大有为于天下”，谋取汗位，统一中国的重要战略步骤。令人叹服的是，他的这番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取得了圆满成功，不愧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我过去观察这段历史，只把忽必烈尊崇佛教看做是宗教问题，而没有看到宗教背后的政治问题，更没有看到是你死我活的夺权问题，看来是很不全面的。

（三）关于元代宫廷中萨满教的地位问题

我早先阅读有关蒙古族萨满教的文章，所得到的总体印象是，忽必烈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派，尊奉八思巴喇嘛为国师。从此，蒙古宫廷萨满教便失去了国教地位，并为藏传佛教所取而代之。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后来仔细阅读《元史》，才知道情况并非如此。

诚如前面所言，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但并没有因此而疏远或限制萨满教，更谈不上取缔萨满教。从元朝宫廷的宗教活动来看，萨满教依旧保持着崇高地位。尤其是蒙古宫廷内某些重要的祭祀仪式和礼俗活动，均由蒙古“巫祝”——萨满教巫师来主持，藏传佛教喇嘛不得干预。这样的局面一直延续下来，直至元朝灭亡也没有任何改变。更为有意思的是，元朝宫廷发布过诏书，限制男觐女巫随意出入宗王大臣府邸。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蒙古统治者信奉佛教，而是恰恰相反，萨满教巫师图谋干预朝政所致。

元朝蒙古统治者的宗教生活，具有多元化特点。对于萨满教和藏传佛教，采取一视同仁、为我所用的态度。成吉思汗对其子孙的重要遗训之一，便是对不同民族的宗教采取宽容政策。兼收并蓄，各司其职，为我所用，从来不独尊某一宗教，压制甚至取缔其他宗教。蒙古人对其他民族的宗教尚且如此开明，何况对本民族固有的萨满教呢？因此，元朝近百年来，从来没

有发生教派之争。元朝末年,白莲教恰好利用了蒙古统治者的宗教自由政策,采取秘密会道门的方式,组织起反元的起义队伍,看来不是偶然的。

以上事实说明,元朝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前后经历了很大变化。元朝中后期的蒙古皇帝,均笃信藏传佛教,将藏传佛教提升到国教的地位,不惜耗费大量国家财富来修庙敬佛。尤其是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更是崇信佛教达到了荒唐的地步,已经完全不同于忽必烈时代了。

(四) 关于科尔沁萨满教和布里亚特部落的关系问题

文献资料和文化资料证明,科尔沁蒙古部落和布里亚特蒙古部落,在传统文化方面存在着内在联系。从古老的科尔沁民歌中,往往能找到酷似布里亚特民歌的曲目,甚至是同一首民歌曲调的不同变体。而布里亚特民歌中,也可以见到与科尔沁萨满教歌舞相似的曲调,让人明显感觉到,无论在形式和风格方面,两个部落的音乐文化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共同性。那么,我们从科尔沁部落和布里亚特部落的萨满教文化中,能否找到一些交流融会的蛛丝马迹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对于古代先民来说,地理即是命运。

1206年,成吉思汗创立蒙古汗国,次年即派遣其长子拙赤率军出征,讨伐东方的“林木中百姓”。当时,属于“林木中百姓”的部落有不里牙惕(布里亚特)、斡亦剌特(卫拉特)、秃马惕等。慑于蒙古军的强大威力,上述部落不战而降,主动臣服了成吉思汗。从此,布里亚特部落便成为蒙古汗国中的一个成员,融入了蒙古民族共同体。

蒙古汗国建立之初,成吉思汗分封其“黄金家族”成员、功勋卓著的文臣武将。拙赤·合撒儿——成吉思汗的长弟、科尔沁部落的首领,被分封于海拉尔河至额尔古纳河流域一带。从此,科尔沁部落和布里亚特部落便成为近邻,共同生活在蒙古高原东部的边陲地带,两个部落得以密切交往,文化艺术方面——包括萨满教在内,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共同成为蒙古高原东部文化风格圈的主要成员。

蒙古部落的形成发展历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从部落名称来看,大凡采用所从事职业来命名的蒙古部落,诸如科尔沁(佩带箭筒者)、乌

拉特(手工艺者)、喀喇沁(制马奶酒者)、乌珠穆沁(种葡萄者)等,由专门为宫廷服役的人员所构成,其形成的年代相对较晚,一般都在蒙古汗国至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高原时期。与此相关,这些职业化部落的文化传统也相对较短,容易受到其他部落或民族的影响。反之,大凡采用动物名称或数字名称来命名的蒙古部落,如克烈(乌鸦)、布里亚特(狼)、乃蛮(八)、都尔本(四),以及采用不可解的古语来命名的蒙古部落,如扎刺亦儿、弘吉刺惕、蔑儿乞惕、乌梁海等,则大都历史悠久,且具有深厚的文化传统。

如上所言,科尔沁蒙古人属于新型部落,形成于蒙古高原统一战争时期,主要不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是由职业军团演变而来。基本成员来自各个不同的部落,如扎刺亦儿人(扎赉特)、豁罗刺思人(郭尔罗斯)、都尔本人(杜尔伯特)等。由于部落历史相对较短,一时难以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因此,科尔沁部落迁徙之初,应该说更多地受到了布里亚特部落萨满教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五)关于科尔沁萨满教发展史上的“四个阶梯”问题

蒙古族萨满教及其萨满教文化艺术,主要分布于科尔沁、布里亚特、乌梁海等少数几个蒙古部落,其中又以科尔沁部落为最。蒙古族萨满教的社会功能,并不仅限于宗教信仰,还兼顾其他重要功能,诸如医药、历法、历史之类,带有综合性特点。例如,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早期历史,实际上是由萨满教巫师口传下来的。那么,科尔沁部落的早期历史,当然也是萨满教巫师所记录的。由于蒙古族萨满教没有文字经书,完全依靠口头传播,故有关部落历史的内容,主要包含在萨满教唱词里。

科尔沁蒙古部落萨满教歌舞中,有一段回溯历史的神谱唱词,叫做《都尔本·德克特尔》。蒙古语“都尔本”为“四”,“德克特尔”则含有阶梯、阶段、层次之意,合起来便是四个阶梯或四个阶段。顾名思义,主要是讲述科尔沁部落的历史。那么,神谱唱词中的所谓“四个阶梯”,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呢?“四个阶梯”分别指的是:“独立支撑之神树”(沙斯蒂尔·噶黑察·毛都),“白色燧石山”(察黑古尔·查干·乌拉),“居庸关四字”(察卜恰勒·都尔本·乌素克)以及“白雪山”(察素图·查干·乌拉)。所谓“四个阶

梯”,其实是采用符号方式记录了科尔沁部落历史上的三次大迁徙,符合历史事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第一阶梯——“独立支撑之神树”。

所谓“独立支撑之神树”,孛儿只斤部落肯特山萨满教祭祀圣地的标志。大凡熟悉《蒙古秘史》的人都知道,蒙古部落混战时期,孛儿只斤部落的萨满教祭祀圣地——豁儿豁纳黑川,生长着一棵高大的蓬松树,形成该部落萨满教文化的特殊标志,体现出蒙古族萨满教的自然崇拜观念。神谱唱词中的所谓“独立支撑之神树”,无疑就是指《蒙古秘史》中提到的那棵著名的蓬松树。忽图剌汗即位之时,曾率领全体部落成员绕蓬松树而舞,将草地踏成了深沟。问题在于,神谱唱词在回溯科尔沁萨满教历史时,为什么要从豁儿豁纳黑川上的蓬松树说起呢?

1206年,蒙古汗国成立之后不久,科尔沁部落即进行了第一次大迁徙,从蒙古高原中心地带迁往东部的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在此之前,该部落曾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中心地带,部落贵族定期参加“黄金家族”的萨满教祭祀活动。因此,神谱唱词在回溯这段历史时,从豁儿豁纳黑川上的那棵蓬松树谈起,将“独立支撑之神树”放在了“四个阶梯”的首位,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阶梯——“白色燧石山”。

所谓“白色燧石山”,即科尔沁部落第二次大迁徙后的萨满教祭祀圣地。

白色燧石山,蒙古语称之为“察黑古尔·查干·乌拉”。有意思的是,此山确实存在,并非虚构,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境内的贝加尔湖沿岸。苏联学者 A. И. 奥克拉德尼克夫在《贝加尔湖岩画》一书中指出:贝加尔湖沿岸的查干扎巴地区,有一座萨赫尤尔泰山,蒙古语意为“燧石山”,上面刻有大量的岩画,乃是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萨满教祭祀圣地。神谱唱词中的所谓“察黑古尔·查干·乌拉”,应该就是指萨赫尤尔泰山祭祀圣地。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科尔沁蒙古语中的“察黑古尔”、布里亚特蒙古语中的“萨赫尤尔”,两个词汇是相同的,只是方言发音有所差别而已。那么,神谱唱词在回溯历史时,为何将“白色燧石山”放在第二阶梯的位置呢?

原来,科尔沁蒙古部落迁徙到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流域之后,因其人口增多,势力不断壮大,逐步向四周地区进行扩张。有迹象表明,科尔沁部落中的一部分人口,历史上曾举行第二次大迁徙,北上进入贝加尔湖沿岸一带,并且将附近的布里亚特部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2007 年秋,我曾赴乌兰巴托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有幸结识了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族学者杜嘎罗夫·巴雅尔先生。他告诉我:科尔沁部落确实进入了贝加尔湖沿岸地区。贝加尔湖沿岸的巴儿忽真之地,至今还有“科尔奇德”部落的遗民。所谓“科尔奇德”便是科尔沁一词的复数形式。因科尔沁部落十分强大,英勇善战,故布里亚特蒙古人尊称其为“阿爸—科尔沁”。

杜嘎罗夫·巴雅尔先生还指出:查干扎巴地区的萨赫尤尔泰山有萨满教神灵守护,乃是布里亚特蒙古部落的祭祀圣地,萨赫尤尔泰山圣地的萨满主教,竟然是一位科尔沁部落蒙古人,名字叫做朝洛蒙·哈斯哈·诺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的推测是,科尔沁部落统治者为了安抚和笼络布里亚特部落,主动承认萨赫尤尔泰山萨满教圣地的崇高地位,并且和布里亚特部落共同举行祭祀活动。同时,为了从宗教信仰上控制布里亚特部落,便由“自己人”来担任萨赫尤尔泰山的萨满主教。科尔沁部落统治者的这一做法,和忽必烈当年尊崇藏传佛教的做法如出一辙,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看来,“四个阶梯”中的所谓“察黑古尔·查干·乌拉”,乃是科尔沁部落进入贝加尔湖地区以后的新萨满教祭祀圣地。显然,科尔沁部落和布里亚特部落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由于两个部落长期交往,必然在文化艺术和宗教方面产生交流融合。因此,科尔沁萨满教神谱唱词中出现“察黑古尔·查干·乌拉”,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

第三阶梯——“居庸关四字”。

所谓“居庸关四字”,即元代科尔沁部落向大都遥拜的萨满教祭祀圣地。

古代文献中,蒙古人将居庸关要塞称之为“察卜恰勒·宝固木塔”。蒙古语中的“都尔本”为数字“四”,而“乌素克”则是指文字而言。那么,“居庸关四字”究竟是怎么回事?神谱唱词中为何将其列为第三阶梯呢?

据史料记载,元泰定三年(1326年)到至正五年(1345年),蒙古统治者在大都北面的居庸关上建筑云台、佛塔、佛像,形成颇有特色的藏传佛教建筑群。关口拱门内的东西石壁上,刻有蒙、藏、回鹘、西夏、汉等五种民族文字的佛教铭文诗。所谓“察卜恰勒·都尔本·乌素克”,当指此铭文而言。铭文诗原文为蒙、藏两种文字,以回鹘、西夏文翻译之,恰好是四种文字。铭文诗的汉文部分,即第五种文字,则是由成都宝积寺高僧德成,根据蒙古文“本意”译写而成,看来没有被计算在内。

元朝初期,科尔沁部落贵族曾不满于忽必烈的统治。当海都从西部地区发动叛乱时,科尔沁贵族、东路宗王乃颜、失都儿等人曾起兵响应,从东面策应海都叛乱。为此,忽必烈统帅水陆大军亲征,并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处死了乃颜等人。延至元朝中后期,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蒙古统治者穷于应付,只好倚重强大的科尔沁部落。事过境迁,科尔沁部贵族的政治地位大为提高,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有所增强。因此,科尔沁萨满教将“居庸关四字”作为萨满教圣地,从遥远的东方拜祭居庸关,看来是十分自然的。

上述情况还表明,元代中后期,宫廷宗教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和忽必烈时代大不相同。首先,藏传佛教不再只是被蒙古统治者所尊崇,而是确立了“国教”地位。其次,宫廷萨满教已经承认藏传佛教的“国教”地位,并且主动向佛教靠拢,从而出现了“佛巫合流”的新局面。所谓“居庸关四字”,便是一条有力的佐证。

第四阶梯——“白雪山”。

所谓“白雪山”,即清初科尔沁萨满教的祭祀圣地。

“察素图·查干·乌拉”,蒙古语意为“有雪的白色山峰”,指长白山主峰白头山而言。那么,神谱唱词中为何将白头山当做自己的第四阶梯呢?原来,此说与科尔沁部落的第三次大迁徙以及清初佛巫两教的生死斗争有关。

科尔沁部落的第三次大迁徙,发生在明朝中期。洪熙元年(1425年),科尔沁部落首领奎猛克·塔斯哈刺——拙赤·合撒儿的第十二世孙,率领所部大举南迁,跨越大兴安岭山脉,进入现今的松嫩平原,被人们称之为“嫩科

尔沁部”。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尔沁蒙古部落南迁的时间,尚存不同看法,这里不加讨论。

明末,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达到了鼎盛时期。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萨满教,由于遭到阿勒坦汗的残酷镇压,纷纷向东方转移避难,聚集于科尔沁草原。何况,当时的科尔沁部落已投靠后金政权,其势力有所增强。而满族统治者恰好也信奉萨满教,与科尔沁部落完全相同。因此,蒙古族萨满教残余势力以科尔沁草原为依托,且得到后金统治者的庇护,一时变得强盛起来,并形成蒙古族萨满教的最后基地。

自从阿勒坦汗皈依佛教以来,萨满教难以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立足,被迫进行战略撤退,逐渐转移到东部的科尔沁草原。萨满教作出这样的战略决策,应该说是正确的。首先,科尔沁部落长期生息于蒙古高原东部的大兴安岭一带,经济生活中的狩猎采集成分比重较大,为萨满教的生长发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大兴安岭山脉地处边陲,交通闭塞,信息不畅,外来文化难以传播,易于长期保存萨满教文化。再次,从民族文化分布格局方面来看,科尔沁部落与“通古斯—满”语系民族相毗邻,且具有相同的萨满教信仰。最后,明末清初,科尔沁部落最早归附于清朝,政治地位较高,军事势力强盛,从而形成了蒙古族萨满教的中心区域。

蒙古族高僧内济·托因,对科尔沁萨满教的兴盛深感不安,遂立志弘扬佛法,亲赴科尔沁草原传教。内济·托因十分明白,想要在全蒙古范围内传播佛教,就必须彻底摧毁科尔沁萨满教。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如同得到阿勒坦汗的支持那样。二是取得蒙古族民众的理解和信任,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为此,内济·托因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努力:首先,他重点展开对后金统治者的说服工作,最终取得了成功。皇太极竟然被内济·托因成功说服,批准他到科尔沁蒙古部落的中心——土谢图汗部去传播佛教。显然,皇太极企图利用内济·托因,通过传播佛教来软化蒙古人的意志。果然不出所料,在内济·托因的多方游说下,土谢图汗率其臣僚皈依了佛教。从此,各部科尔沁蒙古贵族纷纷效尤土谢图汗,先后皈依了佛教。

其次,为了更好地向蒙古人传播佛教,做到入乡随俗,与时俱进,内济·托因决定对传教方式进行大胆改革。他改变过去只用藏语诵经,不看对象,照本宣科的惯例,转用蒙古语诵经传道,此举果然为蒙古族民众所欢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内济·托因不愧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在科尔沁部落的传教活动,与他在土默特部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得到了圆满成功。

科尔沁萨满教首领——郝伯克台·博,为了维护其萨满教利益,挺身而出,率领门徒反对内济·托因的传教活动。然而为时晚矣,在僧俗封建势力的联合打击下,郝伯克台·博的反佛斗争最终归于失败。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也只好向佛教妥协投降。科尔沁地区至今流传着郝伯克台·博与内济·托因斗法的传奇故事,曲折地反映着佛巫两教的这场殊死斗争。

科尔沁萨满教中的少数原教旨主义者,以女巫锡日拉杰·阿拜为首,拒不妥协,铤而走险,提出所谓“斩下僧人头,祭坛作牺牲”的口号,采取恐怖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佛教僧侣。不过,由于科尔沁统治者的严厉清剿,他们的恐怖活动收效甚微,难以在草原地带立足,遂被迫退却,进入长白山一带的深山老林中,继续进行反佛斗争。这便是科尔沁萨满教“四个阶梯”中“察素图·查干·乌拉”的来历。

科尔沁萨满教产生发展的历史,与该部落三次大迁徙的历史密切相关。古老的萨满教文化,被人们称之为“活化石”,埋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典故。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件工作,便是将萨满教文化中有关部落早期历史的内容,同文字形式的历史文献加以比较,发掘出一些新的资料来。诸如,“白色燧石山”是科尔沁部落和布里亚特部落共同祭祀的萨满教圣地,如果不是在萨满教神谱唱词中保存下来,恐怕很难为后人所发现。

蒙古族萨满教音乐形态,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本身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以至达到历史的高峰,再逐步走向衰落灭亡的过程。神谱唱词中的“四个阶梯”,便是概括了科尔沁萨满教所走过的兴衰史。问题在于,如何将萨满教音乐形态的发展演变过程,同萨满教本身的历史结合起来,勾勒出一幅萨满教音乐发展史的大致轮廓,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六)我和萨满教文化的因缘

科尔沁蒙古人的血液中,流淌着萨满教文化的神秘基因。我对萨满教的最初印象,应该说是来自童年时代。朦胧的记忆中,我的二伯母身患重病,医生用药,喇嘛诵经,多方治疗均无济于事。于是,便请来一位当地有名望的“博”——萨满教巫师降神作法,驱鬼祛邪,进行治疗。遗憾的是,二伯母的病并没有见好,不久便去世了。后来,我们村又有几户人家请“博”降神作法,我有幸都观看过。

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巫师们的唱歌跳舞,尤其是驱邪巫术,小孩子是不能观看的。据说,有些精灵会看上那些长相秀美,聪明伶俐,能歌善舞的儿童,不请自来地附体到他的身上。然而,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宁肯冒精灵附体的风险,也不肯放过观看“跳萨满”的机会,偷偷挤在窗外观看。有趣的是,年龄稍大的孩子,竟然能记住萨满巫师的神曲和舞蹈,野外放牧时刻意模仿,带领小朋友们边唱边舞。当然,对于这样的模仿表演,大人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精灵们会被孩子们的歌舞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大驾光临,附体到孩子的身上。这样一来,孩子只能拜师学巫,将来成为一名职业萨满教巫师了。孩提时代的上述有趣经历,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科尔沁萨满教的传承方式,主要是通过血缘关系,尤其强调母系血缘关系。如前所言,因模仿萨满教歌舞而精灵附体,最终成为萨满教巫师的人,称之为“陶木勒·博”,意为“被相中的巫师”,只属于个别现象。据老人们说,自清代以后,从科尔沁地区的孛儿只斤氏家族中,不再产生萨满巫师了。因为,当年反佛的郝伯克台·博,便出身于孛儿只斤部落。内济·托因为了杜绝后患,立下了一条戒律:从今以后,凡是“嫩科尔沁十旗”内的孛儿只斤氏家族成员,一律不准从事萨满教巫师职业。

对于社会群体而言,民俗往往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上世纪70年代,我曾深入到大兴安岭腹地采集民间音乐。一位拉四胡的业余民间艺人,技艺高超,且掌握很多曲目,我从他那里采集到不少民间乐曲。他家里有老母亲,听说还是一位“乌都干”——萨满教女巫。但母子二人却没有向我提起过。当